

梁启超简论

季镇淮

一、生平和思想

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2月23日)生于县南西江入海口半岛上的熊子乡茶坑村下层文士家庭。祖父名维清，字镜泉，秀才，为县学教谕。父名宝瑛，字莲涧，科名不得志，教读乡里。梁启超幼从家庭及城乡多师受学，六岁读毕《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少年科第，十二岁为秀才，十七岁中举人。自称：“启超自十七岁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道”(《适可斋记言记行·序》)。梁启超少年所学，以肄业于广州学海堂(道光四年两广总督阮元所建立)三年为重要阶段，仍为乾嘉以来正统派“汉学”及词章之学，即所谓“旧学”。从中举后，于光绪十六年(1890)秋，他和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同奉南海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番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三十自述》)。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梁启超从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西学，乃至佛学，思想为之一变。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启超并参与校勘、分纂。到光绪十八年(1892)，他学于万木草堂又三年，时年二十。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战争，中国完全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举国悲愤，国人同仇敌忾，而全昧于世界大势。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中日和议成，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上书清廷请变法；七月，发起并领导京师的强学会，主办《中外日报》，遍送士大夫，每日作一篇数百字短论，此梁启超办报之始。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和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七月一日发刊第一册，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并开始连载著名的《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同年为《西学书目表》，搜罗、总结二十多年前旧译西学著作约三百种，可见其留意西学是非常广泛而深入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入湘月余，有《上陈中丞书》，说陈宝箴据湖南“自主”，“脱有不幸，使乘輿播迁，而六飞有驻足之地；大统沦陷，而种类有倚恃之所”（附见苏舆《翼教丛编》）。因此为陈宝箴所忌而“稍稍疏之”（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陈宝箴传》）。梁启超讲学“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四十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启超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臚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掎击无完肤（《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讲学影响迅速广泛深入，对湖南的学风和士气的激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发展，一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士大夫保守派和统治集团顽固派所嫉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八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梁启超于九月流亡日本，作《去国吟》：“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

掉头不顾吾其东。”从此，梁启超居留日本，先后游历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1899—1900），创办《清议报》（1898、11，旬刊）、《新民丛报》（1902，正月，半月刊）、《新小说》（1902，11，月刊）等期刊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主张开明专制，宣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和革命派辩论立宪主张日益激烈，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死对头。但梁启超同时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集中外历史文化于一身，努力于“新学”即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也起了广泛影响和一定的积极作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遂趋向实际运动，与熊希龄、蒋观云、徐佛苏等进行组党活动。次年（1907）九月成立“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月刊）。宣统二年（1910）又办《国风报》（旬刊），“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宣统三年（1911）辛亥十月，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推翻了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次年（1912）三月，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氏所窃取。梁启超于九月由日本返国，备受各界欢迎，参加了许多欢迎会，作了许多演说。十一月创办《庸言报》（半月刊）。他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通过袁世凯的统治可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他热心从事政党活动，先参加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又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和张謇等为理事。一九一三年三月三日，梁启超召集名流集会于北京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分韵赋诗，为袁氏天下粉饰太平。七月，熊希龄为国务总理；九月，熊内阁组成，梁启超为司法总长。一九一四年二月，

又为币制局总裁。次年八月，杨度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运动，暴露了袁世凯专制独裁，勾结帝国主义，阴谋建立袁氏王朝的野心。梁启超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与蔡锷等发动护国之役，反对袁氏称帝，“共和再造赖斯人”（章炳麟《挽梁任公联》语）。反袁运动结束，辑《盾鼻集》一书。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羞愤死，黎元洪继为大总统。梁启超又与袁氏旧部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合作。次年七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同月，他通电反对安徽督军张勋拥清逊帝宣统复辟，后即参与冯、段讨伐复辟之役。梁启超的改良主义立场，决定他始终不能不依附封建势力。同年十一月，由于冯、段内部矛盾，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梁启超亦随之辞去财政总长之职。从此，他离开了上层政治活动而致力于著述。

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十二月下旬，梁启超同蒋方震、丁文江等启程赴欧洲游历。他们从一九一九年二月起，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国二十几个名城。到秋、冬间，梁启超在巴黎附近的白鲁威便把这一年所观察、所感想写出来，成《欧游心影录》一书。次年三月，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后，完全放弃政治活动，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学术著作。《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乘起信论考证》、《梁任公学术讲演集》、《陶渊明》、《朱舜水年谱》等相继出版。他的改良主义立场始终未变，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他和清华学校关系较深，一九二二年即开始在清华兼课，一九二五年九月，正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所开课程有《中国文化史》、《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等。在清华时期，写成了《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一九二七年六月，完全脱离清华研

究院。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五十七岁。

二、文学革命论及其创作实践

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改良运动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革命论。他所谓革命就是改良。

(1) 诗界革命

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和夏曾祐、谭嗣同曾试作“新诗”，虽没有什么成绩，但反映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要求，还是很有意义的。后来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中，登载了改良派及其他作者的许多诗篇，并不断地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呼声。他的“论诗宗旨大略”已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由日本去夏威夷舟中的《日记》，而讲得最为充分则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新民丛报》第四号开始连载的《饮冰室诗话》。在后者，他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批判以满纸堆集“新名词”的作法，重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但亦不绝对排斥新名词。这是诗界革命论的一个发展，也是近代进步诗歌的一个概括和理想。他认为“近世诗人能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他所谓新意境，实指包含新思想新知识的内容，所以他又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镕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新中国未来记·总批》）。后来梁启超于《新小说》中登载《杂歌谣》，

形式语言都趋向通俗化，又赞许其与音乐结合，使之能歌唱，似传统乐府诗而有新面貌新精神，发挥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这是诗界革命又一重要内容。

（2）小说界革命

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及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缘故，他认为文学有“移人”即改变人们思想感情的作用，“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所以他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又具体指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这是小说所以能“支配人道”或“移人”的根本原因。因为小说有这四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则小说本身的品质就成为改良社会的关键问题。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都是从小说来的。所以他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这篇论文，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创作的繁荣，以及古典小说的研究评价，起了积极的作用。改良派人物如严复、夏曾佑、康有为等，都很重视赞扬小说，以梁启超这篇论文的影响为最大。

（3）文界革命

梁启超“文界革命”的提出，亦始于上述《日记》里。他的“文界革命”论和“诗界革命”论一样，起点于欧西文化思想的输入，这是内容的革新。后在《新民丛报》第一号“介绍新著”栏介绍严复译英国亚当·斯密《原富》时说：“但吾辈所犹憾者，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

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洗畅锐达之笔行之，安得使学僮受其益乎？”此对严译文体的批评及译笔的要求，亦可见其“文界革命”的主张就是改古文体为通俗文体。又后于《新小说》第七号“附录”栏开始连载《小说丛话》，其第一条即梁氏手笔，这里可以窥见他的“文界革命”更具体而重要的内容。他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他回顾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唐代韩、柳之文“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他进一步说：“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一大进化，”就是由于“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又说：“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为儒家、禅宗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有文章，莫不有然。”可见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已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俗文学史的看法，已有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不过当时他又认为“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这是改良派提倡“文界革命”的本色，从理论到实践，他们还不能完成文界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文学创作实践上，梁启超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他都写过，而以散文为大宗，他开创了散文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他“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幼学为文，学晚汉魏晋”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焉，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梁启超的“新文体”，对一切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王韬以来散文社会化进一步的发展，为“五

“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广阔前进的道路。梁启超的散文遗产，异常丰富，应有尽有，大要可分政论、传记、杂文三大类。政论如《变法通议》、《排外平议》、《新民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等，都是现实政治、社会的产物，或为原则议论，或为具体事论，务于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现实和历史意义，有思想认识价值。他的传记文，长短大小不一，作风亦多变化，有些略似旧史传，如《殉难六烈士传》（见《戊戌政变记》），叙事谨严，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有形象性，代表其早期传记文风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作《中国四十年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即《李鸿章传》和《南海先生传》，自觉地改革中国传统的史传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并溯源于《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强调写传记写得像其为人，符合历史的实际，写出真实的历史，似只强调其历史性，不曾留意于传记文的文学性。他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实际都是写一个时期的历史。杂文亦大量存在。这里所谓“杂文”，就是指那些内容形式多种多样、篇幅较小，难以分类的文章。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自由书》（专集第二册），成于“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则是读书笔记或随感录之类，是最初一本杂文集。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清议报》出版一百期，他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词……》一文，其中有云：“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这里梁启超自己提出的三篇，确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虽篇幅较长，亦当归于杂文一类。它们从内容到形式语言，都为前此所未有，实“开文章之新体”。它们都不是通常的政论文，而只是以政论的内容，出之以特殊的形式，指

出现象，提出问题，发为感慨，振奋人心。最突出的是《少年中国说》一篇，它极力歌颂少年的富有朝气的精神作用，振奋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日益衰颓的人心，不嫌重叠堆砌，反复强调，多用譬喻，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打破一切格式，运用各种手段，力求表达一事一理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才华横溢，气势奔放，感情充沛，语言丰富，有强烈的鼓动性，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梁启超充分地发挥了散文宣传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叠累赘的缺点，过于疏展铺陈，但就形式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是代表散文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梁启超作诗较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今存古近体诗三百六七十首，词六七十首。他热心提倡“诗界革命”，但并不以诗人自命，而以余事为诗。《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太平洋遇雨》、《亚澳归舟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爱国歌四章》等等，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富有自豪感和积极乐观、献身革新的精神，歌颂新天地、新思想、新文化，突出地歌颂爱国主义，有进步意义和认识意义。作风表现了自己诗论的特点，即旧风格含新意境，亦不排斥新名词。一般热情奔放，直抒胸臆，朴实晓畅，格调妥当，足称一种“新派诗”。自云“诗半旧”，亦符合实际。

梁启超的小说有《新中国未来记》，是一种政治小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绪言》），即利用旧小说的形式，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全书设想写出未来六十年维新派当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前十年是预备时代，由君主立宪，各省自治，过渡到召开国会，全国统一，建立“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这个理想的新中国是由清德宗皇帝让位又被国会选为第一代大总统建立起来

的，走的是“折中调和”的一条路，而不是“那破坏一条路。”可见作者企图用形象化的方法，宣传自己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小说开始发表于一九〇二《新小说》第一二三号，共只写了四回。作者自言：“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自我批评是对的。但又说：“虽然，既欲一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因而又不得不承认“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绪言》）。然而在第三回后写“总批”，又非常自鸣得意。但得意处只是政论文，而不是小说。第四回写中国苦难现状，小说主人翁黄克强同李去病游历旅顺、大连，遇一“少年中国的美少年”陈猛，借陈猛的歌唱，介绍摆伦(Byron)及其诗篇《渣阿亚》(Giaour)和端志安(Don Juan)，赞扬摆伦的诗歌“倒像有几分是为中国说理哩”，“句句都像是對著现在中国人说一般。”接着便写俄国人对大连、旅顺的暴虐统治，视为中国被瓜分的缩影。这一回虽仍不是好小说，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作者在“总批”中指出索士比亚、弥尔顿、摆伦等“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便是中国“诗界革命”的方向；写“瓜分之惨酷”实“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

梁启超有翻译小说《佳人奇遇》十六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书也。”载《新小说》第一号，译者列为哲理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载《新小说》第二号，译者列为语怪小说。《十五小豪杰》共十八回，梁译前九回。

梁启超也写过戏曲，有《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但都没有写完。《劫灰梦》和《侠情记》都只写了头一出，《新罗马》也只写了六出，用传奇形式反映中国现

实政治和外国近代历史。作者认为比《西厢记》、《牡丹亭》强，是戏曲的推陈出新，在当时也就是戏曲界革命。作者写戏曲比写小说艺术上成功得多，韵散文结合，旧风格含新意境，运用新旧语言词汇自然纯熟，无扞掇新名词的痕迹，足见作者在文学方面的革新努力。《新罗马传奇》每出后有扞虱谈虎客（作者少年同学韩孔厂）批注，对理解作者创作用心和长处颇有帮助。

梁启超有极其广泛的学术研究，凡今日所谓社会科学各部门，几乎无不涉猎，其广度在并世学人中少有其比，特别提倡历史研究。他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新史学》，即提出“史界革命”口号，批制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明确目的，探讨理论，缕述方法，总结史学史，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实际研究包括古今中外，对许多历史时代和历史部门，特别是对许多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个别的、历史的研究。形式多种多样，或考证，或概述，或专著，而汇归于已在著作中的一部分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梁启超不仅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宣传家、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个极其渊博的学者和杰出的史学家。他的史学研究遗产实开近代、现代新史学的先路。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开创近代风气人物之一。

三、本集和研究资料

梁启超著作，至今无善本。最初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止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为编年体，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局后编《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为分类体，“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分”（《凡例》），断至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同年出版。此后增订版本，不能悉记，举其要者，有：一、《饮冰室全集》，一九一六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兹编略师科学分类解析之意，括为四类：曰论说，曰记述，曰杂文，曰美文”（《例言》）。二、

《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梁廷灿编，一九二五年中华书局出版。此编分为五集：一集，戊戌以前作；二集，居日本作；三集，归国后至欧战前作；四集，欧战至最近作；五集曰附集，录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三、《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一九三六、三七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本编以编年为主，搜集已印未印诸作为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附门人笔记若干种：约以时代先后为次。专著中又各自有类，而第其年次”（《例言》）。此集最后出，搜罗未尽，亦非全集。

梁启超全集卷帙浩繁，初学未易卒业，中华书局于一九一六年选其重要著作三十四篇、分为四卷，为《常识文范》“是编凡采十余万言，亦即为全集提要钩玄之文字。先读是编，进读全集，此其一助”（《例言》）。

关于梁启超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术的研究，其本集及其所办《时务报》、《清议报》等杂志，可以钩稽而得其大概。其中可直接供参考者有《三十自序》一篇和《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六节，都为自我评传文字，简括客观，颇称允当。他逝世后一月，即一九二九年二月，郑振铎作《梁任公先生》一文附有《梁任公先生年表》（见《中国文学研究》第五卷），这是梁氏逝世后研究他的最早著作。在梁氏生前及此后，研究近代人物的著作，其中或详或略多有关于梁启超的论述，兹不备列。专著则有：一、《梁任公先生年谱》一卷，杨复礼编，一九四一年新河南日报铅印本；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梁思庄藏有稿本，一九八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合订一巨册，搜罗梁氏许多书札，记述颇详；三、《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撰，不分卷，稿本；四、《梁启超传》，孟祥才著，一九八〇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近年研究梁启超篇幅较大的一本评传。至于他的文学作品及其思想的评论，自其生前以来，或入选集，或载入思想史、文学史，亦屡见不鲜，兹亦不备列。